

文庫博物館專集（十三）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增刊 第一〇一期 ——
(一九九六年十月七日出版)

1.【文献资料】	关于六月二十七日大会声明	蒯大富
	致叶林同志	蒯大富
	再致叶林同志	蒯大富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三司）宣言	
2.【历史回顾】	没有“出笼”的红卫兵通讯	金 凤
	回忆聂元梓以及北大文革	杨秉真
3.【自由论坛】	人到中年的“红卫兵”世代	印红标
	刘少奇扮演的角色	王 湘

本刊所载的任何形式的稿件均不一定代表编辑、《华夏文摘》或CND的观点。

（一）不管怎么样，这次大会起码在客观上是一次政治迫害大会。我希望这是由于工作组调查不周所犯的 error，但愿不是预谋的政治迫害。

建议大家好好学习《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一文，对照我校目前情况，再认真分析、思考。

（二）我非常体谅、非常理解大多数师生员工对我采取的态度。如果对待反革命，应该这样。你们现在对我恨之入骨，骂我，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三）昨天晚上大会的发言者（除我以外），采取了捏造事实、无中生有、造谣撒谎、歪曲事实、断章取义、小事化大、乱下结论等各种卑鄙手法。我将逐个澄清。不过这表明了他们是非常软弱的。

（四）高压政策，本身就是软弱的表现。不过，我再一次表明，对我的效果为零！要我承认我是反革命分子，这永远也办不到！就是上了绞刑架，我也将宣布，我是革命者，我是坚决革命到底的！

（五）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我们身边。我有一千条理由、一万条理由相信，这股黑风将被压倒。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终会弄清楚。

（六）党中央和毛主席在群众中享有极大的、不可动摇的威信。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是无穷的，群众的觉悟水平是很高的。我们的叶林同志^②，不要错误估计形势。

（七）再诚恳进叶林同志一言，这样的大会，从根本上来说，是否对文化大革命有利？望您考虑。很可能起着很大的压制作用。

三思啊，同志们！

蒯大富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编注：① 六月二十七日大会：由工作组召开的批判蒯大富等人的全校大会。

② 叶林：当时中央派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组长。

∞ ∞ ∞ ∞ ∞ ∞ ∞ ∞ ∞ ∞

致叶林同志

叶林同志，你好！

今天，我想对你说几句话。

一，说实在的，我压根儿没有想到，“小小的”蒯大富竟有如此“威力”，不得不使工作组要集中全部精力来把他“压”下去。声势之大是空前的，全校写大字报对付一个人，游行、示威、开全校大会、广播等大手段都用上了。这样的声势对蒋南翔都没有用过，不能不使我敢到“幸福”。

殊不知蒯大富“又臭又硬”，死不屈服。你大概有点心虚了吧？如果心中还很踏实，还有手段没拿出来，那很好，我等着。顺便说一句，我将用我使得出的一切手段应战。

二，你说过：“向工作组夺权，这不是向无产阶级夺权吗？”“向无产阶级夺

权就是反革命行为”，“蒯大富要夺工作组的权”，言下之意，蒯大富就是反革命。在你的启发下，“打倒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口号满天飞。

我想，您是老革命了。什么是反革命，您一定很清楚。那您凭什么说我是反革命呢？“向工作组夺权”这句话我从未说过，是您强加的。那么凭什么呢？就凭我把毛主席关于政权的思想具体应用到学校来吗？①难道就凭我提出“要”考验工作组吗？难道就凭我提出“工作组的大方向有严重的错误”吗？等等，就凭这些我看不能给我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吧。

何况，你们并没有用大量的事实和充分道理来证明你们的“大方向完全正确”，是“毛泽东思想的方向”，反而让那些捏造事实、歪曲事实、胡说八道的人大放厥词，对我进行无耻的攻击，我不能不表示遗憾。

但愿这是您由于调查不周所犯的错误，而非常不希望是你安排的政治迫害。

三，叶林同志，请您睁开眼睛看一看，到底都是谁在全力支持你们？那些从前是保皇的人，摇身一变为“革命左派”，那些投机革命分子成为你们最得力的助手，甚至原黑帮打手叶×等一群，也大喊大嚷：“坚决支持叶林同志！”而那些一直是眼睛最亮的真正左派，对你们提了些正确的意见，你们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大打出手，施加政治压力，使得他们不得不检讨，交代什么“罪行”。我见过非常痛心！我想，这也是您——真正的革命者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吧。

四，看看“六·二二”事件以后的情况吧。原来还有不少同志敢于向工作组提意见，而现在由于高压政策，谁还敢对工作组说半个“不”字呢？你们一来就拼命树立对您和工作组的迷信和盲目崇拜。以后六月二十七日，大会发言有人喊出“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这样极端反动的口号时，台下鼓掌不算，主席台上竟有多人报以热烈的掌声。我实在难以理解。这种高压政策使人们感觉到一种恐怖气氛。我不禁想起当时校党委的高压政策，使人不敢发言，他们怕交不了账，慌忙命令同学“提意见”。处于目前我们学校这种情况，叶林同志，我真替你担心，如果你不谎报的话，你怎么向北京新市委交帐？怎么向党中央毛主席交帐？

五，我希望你好好抓一抓工作组。尽快“统一思想”。已有可靠的迹象表明，在工作组内，有同志支持和同情我们。要抓就抓在前面，抓晚了后，怕到一定时刻，工作组内真正的革命同志，要起来揭发你们领导所犯的严重错误。

敬爱的叶林同志，时间紧的很哪，赶紧安排好计划，准备下一步吧，我耐心地等待着。不知怎么的，我的信心越来越足。拿起毛选，就象毛主席在身边似的！

祝你身体好！

致

革命敬礼！

蒯大富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注：① 蒯大富六月二十一日在“大家想一想”这张大字报上批了一段话：“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当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 ∞ ∞ ∞ ∞ ∞ ∞ ∞ ∞ ∞ ∞

再致叶林同志

叶林同志，您好！

上次给您的信大概收到了吧，不过没得到您的回音。也许是工作太忙了。

今天，我想再对您说几句心里话。

一，我真佩服您的高压政策过硬，效果也十分惊人。这几天，您大概很高兴吧。除了蒯大富，差不多都被“压”过去了，您还准备怎样对待我呢？

通过这几天的领教，我很体会您大有几手。虽然你们对付校黑党委没有什么大本事，迟迟不安排作战方案，但是你们对付我的过程中，却显得十分精明，计划安排的十分周密。

压上加压，再加再压，这大概是您的传家宝吧。

叶林同志，您现在是否认识到，高压政策对我的效果为零？如果没认识到，希望您能早点拿出更大压力的高压政策，再试一试，看灵不灵。如果您已认识到高压政策不能使蒯大富屈服，那么，您是否考虑换别的一手？

二，切切提醒您注意，您千万不要这样想：蒯大富事件不了了之，算了吧。

这场大是大非的辩论是你们挑起的。你们的行动严重地损害了党中央、毛主席和北京新市委的威信。我们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不得不拿起大字报这个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进行应战。然而，你们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对我们施加巨大压力，甚至对我们进行政治迫害，将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

你们现在还想对蒯大富事件不了了之，那是办不到的！辩论你们既然挑起来了，那么下面怎么走，就不可能按照你们的意志行事。叶林同志，我要严正告诉您，如果不把蒯大富事件作出真正符合革命利益的处理，想走为上计，这种想法未免太幼稚了。要战斗，咱们就得战斗到底，不决胜一胜负，誓不收兵。

三，从六月二十二日到今天，已经十天了。这几天几乎全是搞蒯大富问题。同学们很着急，都说校党委还打不打了？他们要来找我算帐。我说我不负这个责任，要叶林同志来负这个责任。

叶林同志，您大概听到很多群众的呼声吧？他们都说要立即判蒯大富是反革命分子，专我的政。只准我规规矩矩，不准我乱说乱动。您准备怎样对待群众的意见呢？是否感到压力很大？

四，我认为，我对我自己是很了解的。我绝对不承认我是反革命。事实上，你们也拿不出任何罪状来，我心里很踏实，没有一点空虚的感觉，也不感到有什么压力。这是真的。不知您是否相信？

五，我作一种大胆的推测：也许您已经认识到，在处理蒯大富事件中，犯了严重错误，而这种错误是由于调查不周，乱下结论所致的。产生的恶果是严重阻碍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如果我这种推测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话，那么您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应

该满足我下面十条要求：

(1)召开全校大会，公开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并作深刻检讨。

(2)宣布蒯大富不是反革命分子而是革命者，赔偿我的政治损失。洗刷一切攻击我的大字报，广播我六月二十八日以后所写的所有的大字报全文。

(3)宣布我组原十人及史复有同志不是反革命分子。宣布刘才堂、王铁成、任传仲、张云辉、刘泉及绝大多数曾经支持过我或同情过我的同志不是什么“蒯氏黑打手”，而是革命者，赔偿他们的政治损失。

(4)勒令那些明知内情而蓄意捏造和歪曲事实的人，勒令那些别有用心攻击我的少数人作深刻的交代和检讨。并解除广大群众被蒙蔽状态。（大部分群众，我不责怪他们）

(5)撤销工化系副组长张茜薇同志的职务。撤换化九的四个工作队员，换上新的经过严格挑选的工作队员到化九来。

(6)重新严格审查文革领导机构。剔除那些投机革命分子和不坚定分子。

(7)全面总结工作组进校以来的工作。解释六·二二事件、王铁成变“疯”事件及其它事件。

(8)通知附中及外校工作组，希望他们不要对与我有过联系的人，施加政治压力。

(9)在做到上述事情以后，立即转入打校党委黑帮高潮，拟下详细战斗方案，揪出真正黑帮分子，七斗八斗，猛斗猛冲，穷追不舍，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10)把我校情况，真实地、详细地、迅速地汇报给新市委及中央，请求指示。

再说一遍，如果您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您就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我上述十条要求中任何一条。

六，如果我上述的推测，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话，即现在您并不认识到自己有什么过错，还是“毛泽东思想方向”，那么，也很好，您还按原计划进行。我等着应战。不过我提醒您注意一下，我就不承认您是调查不周所犯的错误的，而认为是预谋的。十条要求已公布于大家，不管到哪一天总会全部满足的。

七，叶林同志，再一次向您表白吧，我的信心更加足。我认为，形势在按照我的估计向前发展。

您已经错误的估计了形势，把表面现象当本质。希望您不要一错再错，错上加错，错到底。就比如说群众的觉悟吧。广大群众在你们捏造事实、歪曲事实、强加罪名的情况下，处于被蒙蔽状态。但是，尽管大部分群众受骗，我还是十分坚定地相信，在群众中支持我和同情我的人还相当不少。别看他们没有发言，但到一定时候，他们要说话的，他们会喊出真理的声音！清华园内，真正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多的很！他们决不是什么压力所能压倒的。他们必将为共产主义事业顽强地战斗到底。您不相信吗？咱们走着瞧！

现在，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已被你们引入歧途，你们已经犯下十分严重的错误

。我为了党的利益，为了群众的利益（群众的迫切要求）我要严正向您提出要求：两天内，对我的两封信作出回答；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对蒯大富事件作出正确的、妥善的处理。如果您不顾党的利益和群众的要求，执意按照你们原来意图行事，想达到你们原来的目的，因而一拖再拖，给文化大革命造成越来越大的损失，那么，我可以老实告诉您，一方面，你们原来的目的永远也达不到，另一方面，群众不会答应你们，我也不会答应你们！咱们把话说在前面，在适当的时候，我将采取强硬措施！到那时，您就可能不可收拾，悔之已迟了！

望您三思，再三思！

祝您精神好。

致

革命敬礼！

蒯大富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日

∞ ∞ ∞ ∞ ∞ ∞ ∞ ∞ ∞ ∞ ∞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三司）宣言（修订）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在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触及人们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全国各地展开。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正在涤荡着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北京成为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中心。我们首都红卫兵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誓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闯将！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是我们红卫兵的最高司令，我们是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小兵。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每个红卫兵都要成为最高指示的努力学习者，忠实执行者，热情宣传者，勇敢捍卫者！“十六条”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制定的，我们要努力学习它，熟悉它，运用它，坚决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它！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造反者。我们生来就是要革命，要造反！我们是毛主席的最忠实的红卫兵，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是我们的最高统帅。我们要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敢”字当头，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敢造反！我们要造帝国主义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资产阶级和一切旧势力的反，向整个旧势力猛烈开火。坚决地、彻底地完成“一斗二批三改”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我们要奋起革命的千钧棒，把旧世界打个稀巴烂。

目前，在革命队伍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分歧和斗争。作为触及人们灵魂的一场大革命，这是活动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关系到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不要革命，敢不敢造反，能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问题。对于这场斗争不能有丝毫的调和和折衷。我们要团结，而真正的团结只能在斗争中求得，在毛泽东思想原则一致的基础上求得。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原则，加强团结，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发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

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的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于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要革命、要造反，前面就必然有困难，有险阻。但是，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年青一代，是毛泽东思想的最忠实捍卫者。我们天不怕，地不怕，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我们必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得更加坚强！

我们红卫兵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首先是有成份论，其次是不唯成份论，而重在政治表现。我们坚决依靠革命左派，以红五类子弟为主体，团结一切愿意革命的同志共同战斗！

我们红卫兵要努力向解放军学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解放军为榜样，坚决执行毛主席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卫人民利益；要雷厉风行，闻风而动，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我们坚信，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必将战胜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必将普照全球！

让革命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

~~~~~

【历史回顾】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没有“出笼”的红卫兵通讯

• 金 凤 •

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起源于北大附中的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原是上海解放日报总编室副主任的鲁瑛被张春桥调到人民日报任总编室主任，他布置我写一篇红卫兵通讯，强调这篇通讯如何重要，要写出“革命的第三代的气势和威力”、“中国革命的希望和前途”等等。

我开始采访红卫兵，找了当时号称红卫兵“五大领袖”的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北师大谭厚兰、北航韩爱晶和地质学院的王大宾。这些人当时正是所谓风云

人物，风头甚健，找他们很费劲。例如蒯大富号称“蒯司令”，躲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一间密室内，外有好几道门岗守卫。我凭人民日报记者证连闯几道岗排闥而入，只见一个青年学生正和几个女学生在说说笑笑，我高声说：“蒯大富在吗？”他不耐烦地大声说：“不在！”我大声说：“你不就是蒯大富吗？我是人民日报记者，特来采访你。”他听了，只得站起来承认自己是蒯大富。对人民日报记者，他也不敢怠慢，于是滔滔不绝，大谈他如何“造反”的“丰功伟绩”。

我对谭厚兰的印象比较好些。她仍住在北师大学生宿舍。一面洗衣服，一面和我说话。她告诉我，她家境清寒，中学毕业后当了几年小学教师，才考上北师大。她谈的仍然是她的“砸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砸烂资产阶级学阀”、“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造反到底”那一套。

聂元梓、王大宾、韩爱晶也都匆匆谈了一下。记得还找了一名中学生女红卫兵好像叫宋彬彬<sup>①</sup>，在天安门城楼上她见到了毛泽东，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文质彬彬的彬。毛泽东说，革命不能文质彬彬，不爱红妆爱武装嘛！<sup>②</sup>她立即改名“宋要武”，可见当时青年学生的狂热心理。

拖拖拉拉采访了二十天左右，我还是写不出来。鲁瑛说我“感情不对头”。他讽刺说：“一向听说你是人民日报快手，几千字文章一挥而就，怎么现在会写不出来？”他找了两名中学生女红卫兵，“帮助”我写红卫兵通讯。

在她们“帮助”下，我们又找了一批红卫兵采访。其中印象最深的是采访中央歌剧院著名歌唱家郭兰英。我看过她主演的《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等，很欣赏她的金嗓子和歌唱艺术。没想到她竟也当了红卫兵。

郭兰英身穿一件花布旧棉袄，对我说，她当红卫兵是被“造反派”逼出来的。“造反派”要给她剃“阴阳头”，她愤然反抗。说自己是贫雇农出身，比谁都苦，比谁都想革命。她立即制作了红袖章，戴在臂上，成了红卫兵，并改名郭卫东。“造反派”就不再造她的反了。

在两位中学生红卫兵“帮助”下，我总算写出了初稿，题目叫“前进吧，毛主席的红卫兵”，排印出来，有一万多字，正好一个版。对初稿，鲁瑛召集几位编辑不断讨论、修改，却怎么也改不好，到最后鲁瑛也不耐烦了，他只好宣布，“先放一放吧”。

后来，红卫兵运动渐趋式微。“五大领袖”也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造反派”的主力逐渐由各地工厂“造反派”担当，于是，我所写的红卫兵通讯便“寿终正寝”，终于没有见报。（摘自一九九五年第九期《法制与新闻》）

□ 转载自《新闻自由导报》213期

编注：① 宋彬彬：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宋任穷之女，文革时为北师大女附中学生。

② 据当时报导，毛泽东的原话是：“要武嘛”。

∞ ∞ ∞ ∞ ∞ ∞ ∞ ∞ ∞ ∞

回忆聂元梓以及北大文革

• 杨秉真 •

前些日子见到一位北大老校友，才知道聂元梓在天津逝世。用他的原话来说，



“老佛爷驾崩了。”

他这么说，既有轻视聂元梓的意思，也有取悦于听者的意思。文革初期我因反聂元梓反江青被“扭送”北京市公安局，之后在半步桥和功德林关押两年。一般群众心目中，我该与聂有所仇怨。

其实，我与聂在文革前便有所相识，而文革期间入狱，同聂有关系，但也不那么大。于今三十年过去了，人已经死了，更谈不上什么怨恨了。

一九六四年我从“军外”退学到北大。与同时代多数人一样，热衷于马克思主义。按当时流行说法，马克思取自两个哲学源泉，即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于是乎就非得学黑学费不可。

北大校园中有两座独特的亭顶古典式建筑，南阁和北阁，二三十年代是女生宿舍，五六十年代北阁是大馆藏书库，南阁则是哲学系教师阅览室，据说其中有不少有关黑费的中外文宝贝。于是乎又非得进入南阁不可。

中学除外，我少年时代可以说是在北大校园渡过的。我认识不少北大人，北大不少人也认识我。记不得通过什么关系了，反正拉扯上南阁女管理员。她很热心，但不能做主，建议我给主管行政事务的哲学系邓副主任写封信，他顺水，她推舟。我上午把信交女营理员，下午便去南阁见消息。她摇摇头，同时递给我一张纸条：杨秉真同志：你要求学习马列主义的愿望是可贵的。但我系阅览室只供本系教研工作使用，并不对外开放。特此答复，邓爱民即日。

看来南阁是进不去了，真理是得不到了，人生是无意义了！见我垂头丧气的样子，女管理员又出主意：“要不你找聂元梓，她是总支书记，她说了算。她原来是经济系的，认识你姐。”北大系主任和系总支书记有家用电话。电话上没说几句话，聂元梓便说：“那你来吧。”骑自行车十来分钟到朗润园，记得聂家在二层楼上。进门是客厅，两边沙发围护一张茶几。现在想来，聂不过四十岁，当时感觉，聂是一位老妇人。

“你是想到南阁看书？”她问。

“嗯。”我随后严肃认真地申明自己的理由。她听了一阵，没有立即表态。

“听说你是一零一中毕业的？”

“嗯。”

看到我有点迷惑不解，她解释道：“我女儿说的，她还在一零一上学，还说你曾是运动队的。”

随着聂的目光，我才发现里屋睡房边一个短发女孩子羞怯的身影。一年半前在我校中学运动会上，我曾扎扎实实地露过风头，获得一百米短跑冠军。随后在北京市中学运动会上，我们几个人又夺得四百米接力金牌，把男四中打得落花流水。在本校低年级的女生心目中，想必成了英雄。

“杨星是你姐？”聂又问。

“嗯。”我又答。

“你姐比你大好多岁吧？”

“嗯。我父亲外出十几年，我母亲和我姐留在鲁北老家。以后鲁南根据地巩固了，才把母亲接去，生了我。”

“战争年代嘛。”聂若有所思，“不少人家都经历不少困苦。”

聂元梓起身，让我稍等，她到里屋拨了几个电话，出来之后告诉我已经说好，我可以到南阁看书，随即送我出门。军队出身的聂总支书记的果断爽快作风，同知识分子的邓副系主任的矫饰矜持，确实大有所不同！

一九六四、六五年北大社教。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或先声。北大社教工作组由北京市委、高教部和中宣部共同组织，再上面是中央书记处，彭真、邓小平，都作过几次指示。聂元梓成为北大社教中揭发陆平党委的代表人物，先攻胜，后退败，再僵持谈判，直到六六年文革爆发。在此期间，我多次听人谈聂，也偶然一二次见到聂，自然谈不上政治大事，只记得她说她女儿也想报考北大。

现在回想起来，北大社教颇具多种讽刺意味，其一在于六四年张盘石工作组支持聂元梓反陆平是依据刘少奇制定的“后十条”和“桃园经验”，而六五年邓彭批示支持陆平批聂元梓则是依据毛泽东制定的“二十三条”呢！当然，六六年来了一个翻天覆地大变化，既往者，不须究！

就我个人而言，如果从北大南阁阅读书中没有获得“真理”的话，则获得了一种极其危险的“习气”。正是此种习气导致以后反聂。运用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神秘武断的立场观察历史进程，再运用马克思“论法兰西内战”中机智讽刺的方式描述政治活动，加之幼稚天真，加之北大处境，不可能不捅乱子！

我对聂元梓的反感，开始于“五二五大字报”。记得六六年六、七月间，就此上书毛泽东，当然不会有什么积极答复，不过也没有带来什么消极后果。以私人身份经由中央办公厅向主席反映情况嘛，倒也没有退回来追究，没人知晓。

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名义上是解决彭真问题，实质上另当别论。五一六通知，发到县团级，林彪讲话发到省军级。因为北大社教同北京市委直接有关，时间上又近切衔接，五月十九日中央调查小组来到北大，内中有康生夫人曹轶欧。

该调查小组先找到北大党委机关，其总支书记伊敏有所犹疑，不愿明确表态。属于党内问题，又属于中央问题，这把明火是不好点的。于是又找到哲学系党总支。聂元梓是社教老左派，聂元梓不在乎，于是“一锅端出去算啦”，于是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对于上层政治无所了解，出于捍卫党的领导和党的纪律，一般北大师生立即奋起声讨聂元梓和五二五大字报。倒是陆平知道有来头，唯有忐忑不安。康生正可绕过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周邓，直接向杭州毛泽东汇报，群众运动起来了，北大党委围攻革命左派，如此等等。而后由毛指令中央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公布聂元梓大字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刘邓暗自叫苦，而这正是康生的意图。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夹杂着人民群众的“阴谋”和政治家的“阴谋”，一发而不可收拾。

一个极端的相信主席，另一个极端的相信人民，这便是当时个人信念的两个支

撑点，没有中间余地。一旦自以为康生，还有聂元梓，是在制造北大群众运动，利用主席权威，达到上层政策目标，便不可容忍了。记得还撰造两个新鲜名词，即所谓注重国计民生的“广义政治论”和玩弄争权夺利的“狭义政治论”的对立关系。自然是套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六六年七月份张承先工作组撤离，北大校文革成立，聂元梓是主任，委员中有杨星、大概也有邓朴方吧。不久便闹分裂，多数人成为反聂元梓派，少数人成为保聂派。聂元梓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学生反她，教员反她，就连哲学系同她一起签署五二五大字报的几个人也起来反她。

似乎每当聂处身危亡，反聂大功垂成之机，她总能从校外“捞稻草”。十月份聂抛出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揭批邓小平；十二月聂跑到上海，揪上海市委曹荻秋，显然是借用上面校外的消息挽救下面校内的危机。聂本人也说过，你们要挖我的老底，揪我的后台，那就挖吧揪吧！

聂去上海造反，我觉得是康生、江青他们的意思，彼此互相利用。由于周总理的干预，聂上海之行不了了之，曹荻秋暂保无虞。我和几个北大学生追去上海几天，回来后赶写一篇评论，反聂不成，却导致首次入狱。

这篇题为“评红旗十五期社论”的文字，曾经广泛印发，我至今仍保留一份。其中骂聂元梓是“政治妓女”，是“天堂里的乌鸦”，是“黑夜里赶路哼小调壮胆子”，不遗余力，也涉及到中央人事。其中写道：

“聂元梓上海之行前后，一层一层地撩开自己的裙衫，让人们朝里看。看她有多么粗壮的大腿，多么坚实的后臀！但当人们抓住她的手脖，大声质问‘聂元梓你就明说吧，你的丈夫是谁？’的时候，她却嗫嚅起来：她同中央文革的关系，毕竟只是一种私通呀！”

这种口气被北大保聂派认为是恶毒攻击，现在看来也是可笑的。当时还只是二十岁出头，还只是一个不懂男女情事的“丑奴儿”，“为赋新诗强说愁”罢了。

我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聂元梓，是一九六七年全校大批判会上。我和我姐从半步桥押回北大，在大饭厅接受批斗。聂主持会场，我在台上坐了二三个小时的喷气式飞机。

聂带头呼口号，“打倒刘邓陶！”我才确知陶铸倒了。刘邓问题我入狱前就有所知觉。对刘少奇没有好感，对邓小平倒因为聂元梓那张大字报反而有所同情。

“你为什么不喊？”我的一翼问。

“你看我怎么喊？”我这驾栽头向地，两翼冲天的飞机勉强回答。

但是，当聂喊“打倒杨秉真！”时，我挣扎一下，“打倒聂元梓！”

后来的情景记不清了，待我苏醒过来，已是躺在半步桥监狱的平板床上。之后不久，李明清<sup>①</sup>回北航被斗死，我更知道革命群众的厉害，再也不敢要求“回校接受群众批判”。市公安局从责任出发，也不轻易迎合高校造反派了。

按当时市局对我们这批大中学生的处理方式，开始连续审讯，之后不闻不问关下去，临放之前要写一份检查，里外有所交代。我在六七年一月已审讯完毕，迟迟

不让检查，也迟迟不得释放。这就同聂元梓有关了。她当时是北京革委会副主任，又同上面有直接联络，市局不能不买帐。不久北京市公安局又被北京市卫戍区所接管，中学“联动”一古脑儿全放，我们则转移到功德林，多关一年。

出来后见到一份中央首长接见聂蒯五大院校领袖的文件，更清楚地知道我们不放的原因，怨不得市局和卫戍区。这场接见的是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地点是天安门城楼。其中同我们相关的有如下记录：

康生：杨星、杨秉真现在在哪里？

聂元梓：关在北京市卫戍区，卫戍区要放，我们不同意。

江青：杨星、杨秉真是特务。

康生点点头：是特务。

江青是一个有口无心的人，康生是一个有心无口的人，而且对我们的情况都不甚了解。聂元梓则不同，彼此相知，不让放人已属过份，说什么特务则更不着边际了。当然，话又说回来，放出来也许更坏。六八年北大疯狂武斗，邓朴方被迫跳楼自杀，范立勤膝盖上钉钉子，岂不更糟！

预审期关单间，之后住进一位中央京剧团演员，因为参加“全轰总”被抓。天长日久，我曾跟他学唱了几场小生戏。印象较深的有“调寇”和“过昭关”。我因此还写过几首怀古诗。

#### 吊伍员

九死一生出昭关，  
负重忍辱下江南。  
欲消壮士十年恨，  
痛答楚王三百鞭。

当然，这里所谓的“楚王”，在我心中是“聂贼”，只是不敢明确写在纸上，以防查狱时出乱子。至于唱戏，则可无所忌讳。夜深人静，几次依靠在狱门墙上哼一段“西皮流水”，发泄一番伍子胥的——其实是自己的——愁苦怨恨，其中“楚王”一律唱成“聂元梓”。于是乎：

我本当拔宝剑  
自寻短见  
父母的冤仇化水烟呐！  
对天发下宏誓言：  
不杀聂元梓心不甘。

其实，同聂元梓真有那么大冤仇吗？不见得。如果说我第一次坐监狱是由于聂或者聂派“扭送”的话，那么出狱后又惹事生非而“二进宫”，则同聂绝无相干。

对聂元梓真有那么大报复吗？也不见得。一九七八年我考取研究生重回北大，聂已被关押审查。记得北京市公安局两名审讯员找到二十九楼研究生宿舍，向我这位受迫害者调查聂罪行。我对于自己一九六六年入狱的解释是：当时年青，不知天高地厚，从反聂元梓到反江青。若不是抓起来，还不知道反到哪里去呢！

“你对聂元梓有什么处理意见？”

“关押四五年，该放了。不过，这是上面的事，我说没用，恐怕你说也没用。”

结果是八二年聂元梓正式判刑十年，大概八六年假释去天津，现在死了。北大文革期间相识相知者为数不少，陆平也已经死了，不死的话应该成为中央领导人。从报纸上看，彭佩云已成为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②。王庆淑到底还是结婚了，听说丈夫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本人则是全国妇联常务委员。八一年最后一次见到石幼珊，仍然是那样风采奕奕，现在还是如此？她的情致应在西语系总支书记任职之上。

八五年最后一次见到孔繁，乡音十足，大概已从社科院宗教所所长退休了。邓朴方的创伤是无法弥补的，范立勤倒只是跛折而已。

刘允若③出狱后病死；陆德④熬过来了，据说经商成为总裁总理。

我八一年离开北大来哈佛，现在还在美国活着，正在书写此文。

□ 原载《北京之春》39期

编注：① 李明清：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之子，文革时为北京航空学院学生。

② 彭佩云：现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③ 刘允若：刘少奇之子，文革前在七机部工作。

④ 陆德：陆定一之子。

~~~~~【自由论坛】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人到中年的“红卫兵”世代

• 印红标 •

如今四、五十岁的大陆中年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大学或中学的学生，大多有过红卫兵造反和上山下乡的经历。文化大革命在他们的思想和人生道路上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迹，至今仍然是许多人难以了却的情结。

当年红卫兵的困惑

大陆中年知识分子一代人既是文革群众运动的参与者，又是那场灾难的承受者。文革发生的时候，他们正值青春年少，在红太阳的烈焰下，他们以革命的热情和虔诚干下许多荒唐、丑陋的事情。同时，他们又是那场史无前例的劫难的受害者。他们的青春和才华在失学、待业、心灵和生活的苦难中消磨。文革对这一代人来说，是不堪回首的往事。那里有太多不能简单地用“彻底否定”来解释的事情，那里有太多前辈与后生难于理解的感情。在理智上，有过红卫兵经历的这一代知识分子普遍承认他们曾经走错了路，干了错事、蠢事。他们一直在进行反思和反省，但是，又很难接受对他们青年时代为理想，即使是为乌托邦而奋斗历史责任感的一概否定，以及对他们反抗官僚特权压迫的造反行为的笼统指责。他们常常诉说自己美好而天真的愿望被愚弄、被利用。在压倒一切的“彻底否定文革”的舆论中，很多人

回避自己的文革造反经历，或者强调自己在文革中所受的迫害或逍遥。有人认为：当文革如泰山压顶一般袭来的时候，有太多的人跪下去忏悔，而迫害过去之后，又有太多的人站起来控诉。这话讲得中肯，中年知识分子也不例外。现在，公开宣言“我不忏悔”的人不多，与此同时，呼吁忏悔的声音也十分微弱。诚然，当那些理应对文化大革命负有更多责任的大人物仍然处在尊贵的地位，不曾认真检讨自己的时候，要求被愚弄的青年人、小人物忏悔，似乎有些苛刻。然而，呼吁忏悔却标示着一种直面良知的勇气，代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超越世俗观念的心灵反省。这一代知识分子需要这种忏悔精神，需要正视过去的、反省和反思的精神。一位有过红卫兵经历的学人说得好：“我们应忏悔，我们应承负起理应由我们承负的历史责任，并为此而再造自我。”（杜鸿林：《呼吁忏悔》，收入金大陆编：《苦难与风流》。）

文革印记今犹在

文化大革命中的痛苦教训，使曾经是红卫兵的知识分子摒弃了对领袖政治权威的迷信，不再相信“战无不胜”和永恒的“伟大、光荣、正确”。但是，在概念、思维方式以及行文的体例等多方面，却难以摆脱文革影响的痕迹。这一代人的精神叛逆，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已经开始。还在七十年代初期，在知识青年中间，思想上的独立思考和离经叛道就已经受到普遍的尊重。林彪事件的突发，更是惊醒了许多青年的痴梦。从广州李一哲大字报在大陆青年中的传抄到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和西单民主墙，他们中的一部分就来自这些青年。然而，对毛泽东左倾教条的叛逆、批判和信仰危机并不等于意识形态的重建。这一代知识分子就总体而言，在思想和思维方式的深处，仍然受着毛泽东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缺乏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优秀文化的素养。在这方面，他们与具有深厚国学功力或曾经沐浴欧风美雨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与在改革开放环境中成长的新一代有着明显的差异。

缺乏系统知识训练

中年一代知识分子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富于顽强的奋斗和探索精神，以对中国社会的深入观察和体验见长，却缺乏文化科学知识的系统训练。文化大革命使整整一代青年中断了文化科学知识的系统学习，把大批大学生、中学生赶到农村边疆从事体力劳动，把他们推到社会底层。现在的中年知识分子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依靠顽强的奋斗和自学成长起来的。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就总体而言，中年知识分子的构成，在四、五十岁的年龄段，呈现青黄不接的状态。尤其是在需要系统学校教育才能有所成就的科学技术领域，人才缺乏，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曲折的社会经历造就了一批成功的人才，例如在农村生产责任制的确定等重大经济改革中，曾经在农村劳动和生活过的一些大学毕业生，起了重要的作用。

文革中的大学毕业生，由于受过更多的教育，在建设性的改革方面，在理论探索方面多有建树，而文革中的中学毕业生，即所谓“老三届”毕业生，在需要更丰富的人生体验的文学等领域表现突出。然而，就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年知识分子仍然是人生体验大于文化累积。不用说这一代人往往是毛泽东语录出口能诵却很少有人熟知子曰诗云，即便是其中的成功者，也往往如批评家所指出的：在涉及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广泛领域时，常常显得捉襟见肘。

“红卫兵后遗症”？

这一代知识分子在青年时代，经历了不断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他们与政治运动有着不解之缘。他们深切地感受到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对中国造成的灾难，也目睹了诸如“四五”运动所显示的民众运动的弱点和力量。他们有更多的政治运动的经

验和教训，从原则、口号的提出到具体行动的组织 and 运作，从积极的参与到消极的防御和回避。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期间，中年知识分子的表现，不论是参与还是回避，都与他们的文革经历相关。那些决心不过问政治的知识分子，劝阻学生的激烈行动，告诫说：从来的群众运动都被他人利用，到头来青年人总是替罪羔羊。说这话时他们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而激进的知识分子则运用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运动的经验，希望以民众运动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

比如说八九年天安门广场所进行的绝食，正是采用了文革期间清华大学造反学生蒯大富的绝食行动来付诸政治要求。此外，即使是向学生提出稳健建议，诸如坚持非暴力，争取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事端，也是和文革群众运动的教训密不可分。

五大领袖今何在？

当年红卫兵领袖人物的现状，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那些有着高级干部家庭背景的原来的老红卫兵、保守派红卫兵的领袖，尽管曾经参与过“破四旧”等摧残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的暴力行动，但是在文革后较少受到追究。其中一些有背景的人物如今还在重要的领导岗位，或者活跃在与政府官员有关系的商业机构。文革以后，他们免于被追究或受到保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文革期间他们尚属年幼之外，还因为他们在文革中主要打击党外人士而保护老干部以及他们家庭的政治影响。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以攻击党内当权派为主要特点的造反派红卫兵领袖，多数受到了清查，即使未受刑事处罚，也断绝了仕途。但是，经济改革给了他们新的出路，很多人选择了受政治控制较少而且不在乎政治履历的下海经商之途。文革期间，北京高等院校红卫兵五大领袖，除了已经病故的谭厚兰，其余四位，即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据说都已下海经商。他们的情况恰如社会上流传的一句顺口溜所云：“毛主席让我们掌权，邓小平让我们赚钱。”这些红卫兵头头，在经历了世事沧桑之后，也找到了他们的归宿。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大陆中年知识分子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起点，尽管他们已经远离，并且背叛了这个起点，但是仍然不可避免地受着它的影响。对于这一代大陆知识分子来说，深刻地认识和反省文化大革命是彻底摆脱和超越过去的必须。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并且会继续这样做。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讲师）

□ 原载《明报》月刊 1995 年 3 月号

∞ ∞ ∞ ∞ ∞ ∞ ∞ ∞ ∞ ∞ ∞

刘少奇扮演的角色

• 王 湘 •

刘少奇作为文化大革命中两个司令部其中之一的领袖人物，代表着十七年的旧官僚阶层，受到许多同情。那么，实际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让我们先来考查一下表现在派遣工作组问题上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以及结果。当时在大中学校的学生，对这场斗争一定记得很清楚。因为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五七年反右运动的继续——它宣判了一大批青年学生的政治死刑。

众所周知，六月二日，毛泽东决定将聂元梓的大字报登报。六月三日，刘少奇决定向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紧接着，六月四日，向各大专院校派出工作组进行“试点”。然后，就像毛泽东指示学生写大字报，冲击党委（党支部）一样，刘少奇指示学生涌向中共中央、国务院驻地，“主动”要求派工作组进驻学校。

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少奇们觉得布置得差不多了，他们于是毕恭毕敬地专程飞到杭州，向仍在苦思冥想对策的毛泽东“请示”。其实，他们是为了试探毛的虚实，同时也希望能就此用“群众强烈要求”和“右派大肆反党”的“事实”来迫使毛泽东吞下这个苦果，接受既成事实。他们知道一旦毛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毛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只有安心去做他的空头太上皇了。

事实证明，毛泽东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政治谋略家。刘少奇，再加上邓小平，都远非他的对手。请示后回到北京，对毛泽东不置可否的却又委托他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暧昧态度，刘少奇们却大为兴奋，以为时机到来，毛泽东已经黔驴技穷了。于是，他们开始发动掌握在他们手上的国家机器，准备像往常一样，把千千万万的，仅仅是不听话，爱提意见，写大字报的年青单纯的学生，一下子打成“反党分子”，“右派”，让他们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当天许多善良的人们，在为当年那些挨了批斗的中共党政要员一掬同情之泪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这一幕残酷的游戏呢？我们看到，刘少奇此时是何等威风，一声令下，从六月五日开始，半个月时间，北京所有的文教单位都进驻了工作组。全国各地也在统一的部署下，步调一致地行动。一场残酷迫害青年学生的行动开始了。

让我们来听听手上握有大权时候的刘少奇是怎样说的。六月十三日，文化大革命仅仅开始十二天，学生百分之百还在学校里，刚刚贴出第一批大字报，幼稚地质问党委：为什么破坏文化大革命？其实，到那时为止，就是包括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内，谁也说不清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就已经对学生杀气腾腾了。他说：“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份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他甚至连中学生也不放过，明确指出，对高中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

看，当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广大青年学生只是抱着共产党教育他们的信念，写了几张大字报，向学校党委领导问了几个为什么，共和国主席就已经把政治绞肉机开动了。他又要吞噬多少无辜的生命？六月二十日刘少奇又一次针对青年学生，告诉工作组和他自己的儿女：“说工作组是黑帮的大字报，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敌人出洞了，这个蛇出洞了，你们消灭他就容易了……。”

现在，对这个迫害事件，谁都绝口不提。似乎共产党镇压人民就是应该的，而人民那怕只是说了一声“造反”，就是罪该万死的。这个历史冤案今天难道还不应该翻过来吗？当刘少奇手上有权，要向人民开刀的时候，他是多么狠毒，他是多么坚决。还要我们举例吗？当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触及到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根毫毛的时候，几十万的青年学生就已经注定了这辈子的悲惨命运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首先表现为对人民发泄对政府和共产党的不满的支持，而刘少奇们表现为对人民，特别是单纯的青年学生毫不留情地下毒手。当时清华大学的学生蒯大富，仅仅写了几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就在刘少奇的（后来常常控诉别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他们夫妇进行迫害的）夫人王光美直接干预下，打成了反革命份子，在学校受到身心的折磨。而刘少奇还咬牙切齿地对他的老婆和儿女说：“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

文化大革命中实实在在存在着两个司令部，事实上，刘少奇们响应了毛泽东挑战，并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不过，刘少奇显然过高估计了他的联盟的力量，更加低估了毛泽东的政治能量，所以，当他想跳出来与毛泽东作决斗时，他马上发现，他的联盟是那样脆弱，甚至连一个回合也坚持不下去。当然，毛泽东也没有估计到刘少奇们盘根错节的势力居然能坚持那么长时间。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运动的时间估计为：可能搞两个月，也许还要多一点。而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在学校首先传达的是两个月，然后是半年。（半年后，刘少奇垮台了，但人民又起来斗争了。）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很难看到中央内部斗争的内幕。现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因为毛泽东的斗争策略，他稍稍地退了几步，马上就让中共铁幕撕破了一个缺口，而正好给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刘少奇们的杀人者的面目。当毛泽东为了夺回自己的权力，不惜打破一切社会秩序时，刘少奇则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与权力，不惜以数以万计的青年学生的政治生命为代价，来与毛泽东抗衡。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刘少奇表现出比毛泽东更残酷毒辣的面目，使毛泽东对他的打击具有了广泛的民意基础。这一点几乎被所有的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者忽视了。如果我们在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把毛泽东视为错误的一方，把刘少奇视为正确的一方，特别在现在毛泽东已经作古的情况下，文化大革命于是就成为一部分群众（造反派）胡作非为的罪恶，共产党的受打击迫害，坚持真理的功劳（它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显然使我们的研究走到完全不符合历史原来面目的错误方向。而这正是中共至今仍然能够维持其专制统治的重要原因之一。

凡是评论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一定会提到刘少奇，都会用他的死，来证明文化大革命中群众专政的残酷无情。事实上，刘少奇（及其一类）之死，恰恰只能证明中共的专制本质，和这种专制的万分恐怖。

刘少奇曾经有一次很精彩的表演，使所有的评论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以此来证明刘少奇是群众专政的受害者，他本人却是伟大的反迫害者。那就让我们来再看一次这个表演吧。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为纪念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人民日报》刊登了这张大字报的全文，并配合发表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论。这一天，北京天安门召开三百万人参加的誓师大会，同时分别在中南海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家中，召开批斗刘、邓、陶大会。

一直赋闲在家的刘少奇，这次真正尝到了被批斗的味道。他的“共产党员的修养”终于也控制不住被侮辱的愤怒了。斗争会后，他一身狼狈地回到办公室，怒气冲冲的，叫来他的机要秘书，自己拿来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秘书说：“你记。我要抗议！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主席。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的制裁的。”

说得好！在当时，作为刘少奇本人，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他的认识是深刻的，抗议的呼声是尖锐的。但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在这个时候，说出这种话，就显得太肤浅，太不负责任，也太自私了。到这个时候，一直到这个时候，……一九六七年八月，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才为了个人的痛苦，搬出了被他长年废置的宪法。就在这样的时刻，仍然没有哪怕是顺便，为中国千千万万的，因为宪法的被遗忘而失去正常生活权利的公民们说一句公道话。他要摆的是国家主席的架子，要说明的是，他和王光美“没有反对过毛主席”，而且“受到毛主席的

表扬”。这样的人，是受害者吗？他还记得他派出（包括王光美亲自出马）的工作组，把多少仅仅写几张大字报，说了几句不同的话的青年学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吗？他还记得在“血统论”、“破四旧”中仅仅由于“出身不好”或在国民党中国时代任过职、作过事就受尽苦难的人们吗？他还记得他指示人们斗争“黑帮”时的那些挂黑牌，戴高帽，坐喷气式的“黑帮”吗？他还记得“右派”们吗？他还记得“四类分子”，还记得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吗？这些人，正是在他这个国家主席的领导下，失去了宪法所规定的一切权利，死的、伤的、残废的、关的、斗的、劳改的、劳教的、失去工作的、家破人亡的……，那时候，谁向他们讲宪法？谁告诉他们公民的权利？谁去倾听他们“为什么不让我讲话”的呼声？所有依照宪法的规定，去争取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的志士仁人们（这句话看起来有语病，但现实就是如此），他们无一例外地受到中共残酷的镇压。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有功劳的话，我想，这就是第一条。文化大革命终于迫使我们的国家主席记起了：原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一本叫宪法的东西。宪法上还有一条“保障每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在我们纪念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的今天，我们实在有必要大声疾呼：所有还记得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特别是目前还在“纪念刘少奇”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们，请牢牢记住这一点。这可是文化大革命的血的教训啊！

刘少奇的觉悟太迟了，特别是对他自己的命运来说。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作为中共主要的领导人之一，他难道不应该对千百万死于非命的中国人民负责吗？仅仅由于他是中共内部某种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他就可以逃避历史的审判吗？被他残酷打击的无辜群众就死有余辜吗？当他是权力斗争中的胜利者的时候犯下的罪行总应该审判吧？自从文化大革命成为“十年浩劫”以来，共产党的所有的舆论，就一直用刘少奇的死，来证明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惨无人道。这显然是在颠倒黑白。中共仅仅用刘少奇们几个人的死亡，就可以证明千百万中国大众的惨无人道，就可以使他们遭受残酷的报复而被认为理所当然。但是，有谁曾经用过无数中国老百姓的悲惨遭遇，用过文化大革命中无数学生的悲惨遭遇，用过在血统论、破四旧中的受迫害人们的悲惨遭遇，来证明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的惨无人道呢？无数的冤魂会在这赞歌声中瞑目吗？时至今日，三十年过去了，远的不说，仅仅从四清到文化大革命他们真正失去权力之前，我们难道还看不出刘少奇们的毒辣的手段吗？

世人为什么如此健忘，为什么这么容易原谅残暴的权力者，而对苦难的草民就那么不屑一顾，那么勇于落井下石呢？

接下来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以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来说，明火执仗的毛泽东胜利了，而试图把毛泽东对他的打击力量转嫁给中国人民大众的刘少奇失败了。这恐怕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吧。可是，我们在“文革十年”论中却看到刘少奇成了文化大革命中受害者的总代表，有意掩盖了他曾经是迫害民众的总代表之一的真实身份。如果我们的智力真的连迫害者与被迫害者，失败者与受害者的区别都搞不清楚，至今还人云亦云地为刘少奇们耗费着脆弱的感情，而对被他残害的人们不负责任地义愤填膺的话，那么我们真不如去给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献上一束鲜花，然后充满深情地说一声：安息吧！二次大战的受害者。

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被人有意作了不公正的报导。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像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斗争一样，他们的夫人，江青和王光美也在卖力地表演。江青到处煽风点火，而王光美则到处泼水灭火。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她们显得比他们的丈夫还要忙。特点是江青因为一直处于权力圈子之外，因此到处抢权，并为此大力扫除一切存在的和可能的障碍；同理，王光美因为一直处于权力中心，于是拼命保权。为此不惜打击一切“不听话”的人们。王光美真应该感谢当年的迅速失败，给了她后来以受害人的身份出来反控江青，扬眉吐气。这对于女人，特别是政治型的女人来说，是多么令人开心的事啊。但作为历史，实在显得有失公允，对同样是积极迫

害民众的中国第一夫人和第二夫人这两个女人，却给予了接近“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的两个极端的评价。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像揭批江青一样，对王光美进行揭批，王光美会是一副怎样的历史形象？她还能够对着被她残酷迫害过的人民笑得那么开心吗？同时，在江青的问题上，也深刻地反映出中共对人权和人性的极端藐视。第一，一个政党，居然可以作出一个决议，来规定一个女人对他的丈夫“只准”如何，“不准”如何，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出身不好？因为历史不清？还是因为“酸葡萄”？反正，这是发生在毛泽东身上的关于人权的斗争。从江青到延安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江青到底有什么罪？但她却等于被剥夺了二十多年的政治权利，这对江青来说是完全无辜的迫害，对毛泽东来说，是刻骨铭心的耻辱。第二，既然承认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为什么又不让她以夫人的身份出现？中共宁愿纵容毛泽东去玩弄、蹂躏无数的青年女子，来平衡他的性生活，也不让他有名正言顺的夫妻生活。如果说，毛泽东畸形的性生活终于还有补偿的话，那么江青就只有在党中央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面前受尽屈辱地守着活寡。而她做错了什么呢？就因为年轻的时候演过戏吗？这种长期的生理、心理、再加上政治的折磨，使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一种病态的狂热，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似乎补过了一段迟到了二十多年的做夫人的蜜月。对此，我们尽可以哈哈一笑，把它当作一种病态。但是，对于一手造成这种人伦惨剧，并且二十多年来一直在旁边幸灾乐祸的中央大员们来说，这算不算是一种病态呢？而这种病态，正是造成中国几十年的大苦难的心理根源。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从联动和大搞血统论的红卫兵身上，不是很明显地看到这种残忍的病态吗？

正确地说，刘少奇的惨死，一是由于他自己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惊慌失措，加上“盟友”们的出卖（刘少奇自己又出卖了多少人），使他败在了毛泽东的皇权之下；二是由于他自己代表共产党实行的专制统治激起民众的怨恨，所以民众对毛泽东的打破现存制度的号召会积极响应，对共产党的各级官员“有气的出气，有冤的伸冤”了。

六九年四月的中共“九大”，正式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是，中共党内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十七年”培育出来的旧官僚决不甘心就此退出政治舞台；同时，三年文革中暴发的文革新贵族也并不满意目前的权力分配，他们觊觎的是中国与中共的最高权力。残酷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但这时，斗争已经与被流放到穷乡僻壤去的广大民众无关了。如果说有关的话，那么就是，每一次中共的权力斗争，都给中国民众带来一次新的灾难和痛苦。六九年十月，由在文化大革命中左右讨好，一心攀登权力高峰的林彪出手，乘实行“一号通令”之机，“顺便”把他的前任，现在对他虽无还手之力，但终有心理威胁的刘少奇“斩草除根”，赶出北京，让他死无葬身之地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两年后，林彪也被周恩来赶出了北京，落得暴尸荒野的结局。不同的是，刘少奇还有邓小平帮他翻案，回到八宝山重享主席香火；林彪就只有永远在塞外的荒漠作他的孤魂野鬼了。写到这里，顺便说一句，如果从中国人的极其需要仁爱精神及海外流行的“落叶归根”的观点出发，是不是可以考虑让林彪葬回他的老家，从而让全世界体会一下中国式的博爱？这是题外话。）如果刘少奇敢于揭竿而起，直陈毛泽东的种种对中国国计民生的危害，提出新的出路，那么，他当然应该受到人民的尊敬和怀念。可惜刘少奇走的是另一条路。他当面对毛泽东唯唯诺诺，背后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设法把砍向他的屠刀，导向人民大众，使中国人民深受其害。这种人，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但要忘却他的罪恶，还要对他表示虔诚的尊敬和怀念？

刘少奇死了，死于一九六九年十月。这时，文化大革命早已经结束，造反派和无辜百姓的尸体已经遍布每一个城乡的街头，塞满每一座监狱的号子。没有一个证据证明刘少奇死于造反派手上，但全世界都知道，刘少奇是死在造反派手上。曾经置无数中国人民于死地的刘少奇终于获得平反，而为中国民主自由而付出无数青春、鲜血、生命的造反派以及完全无辜的以千万计的民众（包括地富反坏右）却沉冤

至今，使自己的亲友都不敢出头那怕仅仅说一句公道话。天道何其不公也。

如果在刘少奇死了二十七年后今天，中国的民众终于可以像刘少奇一样，高举宪法，大声地宣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有说话的权利”，而不再有成为反革命等等的迫害随之而来的话，刘少奇也可以因为他当年的这一举动稍赎罪行了。

只是不知道中共是否愿意给予刘少奇这样的机会？

□ 原载《北京之春》第38期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本期责任编辑： [华新民（美国）](#) <cnd-cm@cnd.org>
本期 校对： 吴放（美国） <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徐名扬（澳大利亚）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 熊波（美国） <cnd-info@cnd.org>
关蔚禾（美国）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萧同（美国） <cnd-cord@cnd.org>
《CND》总编： 温冰（加拿大） <cnd-manager@cnd.org>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LISTSERV@UGA.UGA.EDU（GB版）

并请注明：SUB（或 SIGNOFF）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LISTSERV@BROWNV.M.BROWN.EDU（HZ版）

并请注明：SUB（或 SIGNOFF）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FTP）：canada.cnd.org[142.132.12.100]：pub/cnd/hxwz

万维网服务站（WWW）：http://www.cnd.org/HXWZ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本期编辑用软件：XLBR2.0 ©严永欣 NJSTAR ©倪鸿波
GBLIST ©陈公权

本刊同时采用 ZWDOS ©魏亚桂 中文软件处理日常编务
